

谢灵运新探与解读

姜剑云 霍贵高 著

中华书局

谢灵运新探与解读

姜剑云 霍贵高 著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谢灵运新探与解读/姜剑云,霍贵高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18.12

ISBN 978-7-101-13591-6

I. 谢… II. ①姜…②霍… III. 谢灵运(385~433)-宋诗-诗歌研究 IV. I207.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70022 号

-
- | | |
|------|--|
| 书 名 | 谢灵运新探与解读 |
| 著 者 | 姜剑云 霍贵高 |
| 责任编辑 | 俞国林 潘素雅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920×1250 毫米 1/32
印张 13 $\frac{5}{8}$ 插页 2 字数 264 千字 |
| 印 数 | 1-15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13591-6 |
| 定 价 | 68.00 元 |
-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编号 D4BZW037)

2018 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重要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编号 201807050102)

序 言

本书题姜剑云、霍贵高师徒合著，实则是在姜剑云教授于南开大学博士后工作站结业所做研究报告基础上撰写的。

姜剑云教授的名字为古典文学界所熟知。从 2002 年出版硕士论文《审美的游离——论唐代怪奇诗派》到如今，他在十六年间不断有新的论著发表，包括他近年出版的两本论文集：《文史索隐——晋唐文学杂考》和《文史探赜——古代文学纵横论》。他早年师从古典文学研究前辈、著名的姚奠中先生，走的基本是传统治学路子：注重资料的索隐考辨，在广阔的社会、思想背景上揭示历史真相，然后做出细致的分析和可靠的论断。他的研究领域集中在两晋到唐五代这一段。从 2001 年秋起在南开大学博士后工作站从事研究的两年间，他又对佛教学术下了一番功夫（后来还在中华书局出了一本《禅诗百首》），这对于开拓他的研究领域和视野无疑大有帮助。他的论作材料丰富，不尚空谈，见解稳实又新意迭出，在当前学术环境中是很难得的。

自从姜剑云教授 2003 年博士后研究工作结业，到如今这部著作面世，已经过了十五年。十五年间他不断地对原来的研究报告补充、修订，又得到高足霍贵高的襄助。如果说写一部学术著作要“十年磨一剑”，那他“磨”这一“剑”所用功夫已经超出五年。可见他们师徒二人用功之多、之勤了。

本书主题是关于谢灵运的。谢灵运在文学史上主要作为“宋

初文咏,山水方滋”、山水诗这一诗体的奠基者被重视的。历来诸多关于谢灵运的论著讨论的也主要在这一方面。1957年汤用彤先生出版他的《魏晋玄学论稿》,其中收录《谢灵运〈辨宗论〉书后》一文,论述谢灵运的《辨宗论》“提出孔释之不同,折中以新论道士(道生)之说,则在中国中古思想史上显示一极重要之事实,似不能不加以表彰”,遂揭示谢灵运在佛教史、思想史上的重大贡献。汤先生同时又指出:“然此事牵涉颇广,今仅能略发其端耳。”其中“牵涉颇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谢灵运与佛教、与佛教思想关系诸问题。而治佛学向称艰难。这也是自从汤先生的卓见提出之后长时期没有得到更深入、更细致地讨论和发挥的主要原因吧。

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谢灵运)著作与方外交游新探”,梳理、考证谢灵运的著述与交游。关于谢灵运的著述和编辑、注释典籍情形,由于相关文献佚存不多,著者在庞大的内、外典籍中爬罗剔抉,披沙拣金,把相关材料搜罗起来。例如谢灵运所著《十四音训叙》,是古代中国论述梵语文字“悉昙”的宝贵文献。书中集录典籍中所存吉光片羽佚文,让人大体可以窥知该文原貌。谢灵运与道士如杜曷,僧人如慧远、慧严、慧观、昙隆等交游与他的生平、思想、创作关系甚大,书中也广泛搜集资料,做了相当细致的考订。这样,就把有关谢灵运生平、著述、交游,其中包括与佛教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考订大大推进了一步。下编“(谢灵运)思想与艺术创作解读”分析谢灵运的思想与艺术成就。谢灵运活动在历史上思想十分活跃、文学发生新变的时期。他敏锐地感应时代潮流,又与儒、释、道都有密切交涉,文学创作创获颇丰。书的下编在广阔的社会、思想、文化背景上对谢灵运的思想与创作成就进行了分析和评价,亦颇有见地。可贵的还有书后的三个附录:年谱、佚文汇编和学界研究成果目录。年谱前人做过,较详的如杨勇的(见刘跃进、范子烨《六朝作家年谱辑要》上册,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本书在前人基础上多有补充,更加详细;佚文较前人(如严可

均)辑录亦有所扩充;前人成果目录的搜集、著录亦十分完备。这些都给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方便。

天道酬勤。姜剑云和霍贵高师徒的多年辛勤劳作必定功不唐捐。由于谢灵运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这部书的面世必然有助于南北朝时期的思想、宗教、文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我作为曾与姜剑云教授合作过的人,很高兴这样的研究成果刊布,欣喜、祝贺之外,特予推荐。

孙昌武

2018年5月1日

序 言

春末时节,接到姜剑云先生电话,要我为他和霍贵高先生研究谢灵运的新著作序。既甚感荣幸,又殊觉惭愧。毕竟做了半生中国古代文学编辑,阅文夥而又夥,可自己的研究写作却少之又少。虽说对魏晋南北朝文学也算积年偏好,但关于谢灵运这位光耀百代又褒贬不一的大家,也只就“玄学尾巴”的盲说,写过一篇小文辩之,丛残小语而已。今将为颇有声誉的名宿、新秀学者著作弁序,实在汗颜,况诸般事务繁冗,几无暇息,故陈情以谢。姜先生坚执再三,又是多年好友,委实无奈,只得忝而成诺。

待拜读过 30 余万言的稿子,我叹服且兴奋不已。尽管在一些局部细节认识上和剑云、贵高尚有差异,凭心而言,几十年来我所读各家研究大谢的文字也不可谓少了,但能够将谢氏生平著述问题开列得这样全面,类分条梳得如此细致,又置诸历史社会文化语境中,娓娓道来其原由始末,却是唯此一见。其中多少问题曩无有及,今姜、霍二先生一无遗落,统统摄入视野。我揣摩,这是欲将谢灵运作为一个内容丰富又相互关联着的整体来系统解读,以求在探析中再现完全的他。用简单机械到近乎愚陋的“学科”检视,这似是逸出“文学”疆界了,可我倒认为,这才是文学的研究真正回归了它的美学本体。

读到下编第五章“‘政治的玄学’与‘有玄无文’”、“‘哲学的玄学’与‘有文无玄’”、“‘艺术的玄学’与‘有文有玄’”,初只觉得形象

生动地勾勒出从正始到永嘉玄学与文学交涉的流程,阶段特点抓的准确,说得显明,且此中更有深意。遂再读,掩卷瞑思。大凡略知这一段历史的人,都会在“有玄无文”、“有文无玄”、“有文有玄”的相变演化中,感察到潜在的社会政治浓重身影的晃动。于此,向来无人不说,又迄今为止无一文能够说尽。姜、霍二先生落墨不多,我的解读是:与其条分缕析穷说难尽,自落“言筌”,何如徒写其形?“恍兮惚兮,其中有象”,给会心的读者带来强烈的冲击与震撼,各以自己的体验去分解吧。这样的学术写作手法,不唯仅见,又透射着那个时代的况味。巧妙!

由是,我顿时豁然:前几年曾有挚友语予云,姜先生“不务正业”,沉心于释家,许久没有新论著面世,嘱我相机劝喻。我虽知佛教、佛学知识对研究六朝文学者是不可少缺的,却亦如此傻傻地哼哼之。当时姜先生只憨憨笑着,满脸诚恳的连声应“是”,不曾有片言分辩。现在看,他那也是一种“闭关”,从知识结构上给自己充电,只待今日破茧涅槃。这仁兄真真是要成精了!

36年前,施蛰存老师看着遵行万云骏老师教示沉入词律问学的我,敲着台子说:“年纪轻轻,这样搞死也搞不出名堂的。要想当专家,先去做杂家。”我至今受益无穷。文学既然是人学,那么,一切有关人的知识,治文学者自需掌握,越多越深越好。不然的话,纵有千柄“理论”利刃,也只能把作家“思想”、“艺术”碎割,甚至剁成臊子,再剿袭某些先验的格套重新凑集臆合,万花筒似的不断“新见”,“跨学科”地乱弹一通,莫说不入肯綮,便着边际也难。因为原本在具体的时空中活生生的有机“这一个”,被普世“理论”生硬地抽象化、概念化,成了一堆冰冷的无机散碎。如此,文学还是人文的存在么?我不断悟解着老师的话,可由于工作性质之限,只是在“大学科”场域里思味求索,而姜、霍二先生却在“这一个”具体研究中,成功地践行着,怎不令人欢欣!

记得施蛰存老师还曾常说:“读书万卷,还要行万里路。不然

的话,你对万卷书的领会总有隔膜,不真切,搞不好还会张冠李戴,把李四说成王二麻子。”万里路上,风俗百别,境况各异。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特定空间内的全部自然、人文因素,决定着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的性格秉赋,这是不自主的必然获得,其中虽各有差,但基本点却概莫能外。影响到创造,投映于作品,便自然会有一方之文。明代扬州王士骥编纂当地时文集《续行素编稿》,在序中就谈及这一问题:“谭吴文者,知有吾党也;吾党之文,实无以逾他邑。”“尝试与二、三子闾他邑之文而志之,‘此若邑之文’,‘此若邑之文’,则十得八、九。又尝试与二、三子闾吾党之文而志之,‘此若之文’,‘此若之文’,则十得八、九。而他邑不尽尔也。”“吾党”与“他邑”,说明一方之文的性格之别,联系“吾党”里的“若”与“若”,则揭示出一个客观现象的存在:在抽象的理论里,“个性”与“共性”是简单截然的两端;在生活中则是复杂相对的,可以根据认知目的需要,从任何适当的角度划为若干层次;下一个层次的共性,到了上一个层次就成了个性?理解作者,解读作品,除了时间维度的考察外,同样要有层层深入的空间维度追问,以还原其生活、创作的真实语境,还原鲜活真切的“这一个”。空间维度的究问或许比时间线索的建构更重要。近些年来,文学研究不分古近现当,一体文化很“热”。文化是一定空间内的存在,带着一方水土的鲜明印记,如果“理论”超拔地脱离了空间具体内含的考问,文化何存?如此研究地域作家,除了籍贯,其人其文与地域风神、样貌传统,也就断无“半毛钱”关系了。睁开空间的只眼,本应是一切人文学科领域研究的必须,遗憾的是,百余年里,“时”“空”二目皆炯炯者,鲜矣。

文学史的构成,依赖于历史中的文学存在。相较欧陆而言,中国文学犹如一派品类繁众、关系繁杂的原始森林,而英、法、德……文学是在单一民族或其一部分的单一文化土壤里生长的孤木,不管是什么科属。用某个或某几个泊来的“纯文学”理论,难以笼盖

通释中国文学，也就是自然的。行万里路，睁开空间观照的眼睛，真真切切感知体会作者所生活的那一方水土赋予其人其文的独特性格，再莫守着洋理论之缺，抱着仅剩时间独眼之残，乃是中国文学研究的亟需。

杨义先生是我的老领导、老朋友，更是我敬仰的学者。《〈离骚〉与屈子还原》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召开座谈会。席间，各位师友交口称赞杨先生研治方法的创新。我发言说，与其谓之“创新”，似不若许之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方法，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真正带回到中国，带回到中国的历史深处。就文学的还原来说，窃以为杨先生尚未臻完足。因为在他还原呈现的屈原身上，我没有读出“多怨”、“犟骡子”的楚人性格，没有品味到从出土漆木器彤红的热烈现世期待与亮黑玄想，又延及今日湖湘人略显执拗的理想主义思想、思维方法的个性特征。这个屈子，尚莫辨东西南北何方人士。北京大学廖可斌教授，常德才俊，竟然认同我的意见，让我喜出望外。勃兰兑斯写《司汤达传》，不判优劣短长，唯图活画其性格风采，所展示者无不可以《红与黑》小说的方方面面找到印证。此方堪称传神，与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东西双璧也。当下许多学者所著作家诸传，或仅差此一步，然纵差半步，亦遥矣。

姜剑云、霍贵高二先生并非作“传”，更绝少有用“空间”词汇，也只存“时间”独眼么？细细品味，原当在二先生心目中，“空间”本是由一个个具体存在的化合而成，所谓“万物皆有佛性”、“一花一世界”也。而其中又“有无数个力，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恩格斯语），作用、关系极是复杂，纵千言万语也恐难穷尽描述阐说。故尔，上编便将谢氏的空间分解成与各色人众的交际往来，逐一考索，明白史实。“解读”但只略陈一二，至于最终证果，却留给读者根据自家的经验联想融合圆成。到底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不尽同于“若”的宝钗、黛玉。文学的审美原理在学术写作中运用，当然合

理,且更饶文学的形象意趣。我以为,这乃是化了道、释二家的宇宙哲思。聪明!

佩服归佩服,编辑的“职业病”禁不住要发作:“性格决定命运”,历史从来验证不爽。谢灵运家世煊赫,自诩“八斗”之才,当遇刘宋庶俗朝世,孤高清傲在所自然。以这样的心气胸襟面对新贵们,岂不是他最后遭际的根由?其以自己之“慧”,鄙夷嘲弄孟太守,已足成一例。如此等等,也是有机完整的谢灵运的一个或一些侧面,在考察他与诸时人交际往来中,似乎不该忽略。遗落了,“各色”就难免片面,有些被既往评论传统说法“定式”束缚之嫌。

拉拉杂杂,满纸“野狐禅”,聊以塞责覆命罢了。是耶非耶,愿诸师友同仁有以教我;村率俚鄙之处,还幸剑云、贵高二先生哂恕不咎。

张国星

戊戌仲夏于京东芳草地

前 言

从国内外学术界动态看,谢灵运研究是热点之一。尽管比较系统而全面地研究谢灵运的著作显得缺乏,但是,单篇论文的数量非常可观,讨论话题比较广泛。尤其自温州成立了谢灵运研究会以来,学术研究得以有计划地展开,成果得以集中推出,交流及时,范围扩大。这是谢灵运研究步入健康发展之路的良好趋势和现象,也是本选题研究得以确立所借力的良好学术氛围与动因。

本选题的研究目的是,在前人与今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图广泛而深入地考察谢灵运的生活经历、价值取向、思想渊源、文学成就、儒道佛思想的调和情形及其加之于文学创作实践的复杂影响,努力做到客观而准确地评价谢灵运其人其文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指导思想是:避免以偏概全,力求全面地研究一个“完整的人”。要全面地研究与解读谢灵运,当不能忽略以下相关重要的讨论话题。

第一,谢灵运的生活道路与思想特征。概述谢灵运的生活经历,考察分析陈郡谢氏在东晋、刘宋不同发展阶段中不同的地位与影响特点,剖析谢灵运面对新生政权希冀与失落从而仕隐反复的矛盾心态,揭示他的悲剧乃政治悲剧和性格悲剧这一特征。谢灵运的玄学思想兼宗儒释道,在仕隐反复的人生道路上,三家思想在不同人生阶段此消彼长,隐显不同,是他调整人生方向的指南。在创作时,他能够驱遣三家经典,随机运用,使他的诗文作品具有独

特的意蕴和风格。

第二,谢灵运的著述。谢灵运的著述涉及多种领域,有诗文赋等文学著作,有历史著作,有佛经译注等:1)据《隋书》之《经籍志》著录,主要有:《四部目录》、《要字苑》、《晋书》、《游名山志》、《居名山志》、《谢灵运集》、《赋集》、《诗集》、《诗集钞》、《诗英》、《回文集》、《七集》、《连珠集》;2)据《旧唐书》之《经籍志》著录,另有:《设论集》、《策集》、《晋元氏宴会游集》、《新撰录乐府集》、《回文诗集》;3)据《文选》李善注著录,另有:《金刚般若经注》;4)据《高僧传》著录,另有:《大般涅槃经》(改治本)、《十四音训叙》。本专题勉力分类并考说上述谢灵运的有关著录,借以多角度地认知谢灵运其人的才学与抱负,以及他在当时政坛、文苑、思想界的身份与地位。

第三,谢灵运的交游。谢灵运的交游比较广泛,其所交游者有:1)家族中人如从兄中书、安成守谢瞻,从弟骠骑记室参军谢弘元,从弟咨议谢弘微,从弟谢惠连;2)隐逸中人如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泰山羊璇之,王弘之,孔淳之;3)政界中人如中书颜延之,中书范泰,江州刺史、卫将军王弘,宋公刘裕,庐陵王刘义真,宋文帝刘义隆;4)释界中人如庐山慧远,竺道生,昙隆,法流,释慧严,释慧观,法勛,僧维,慧骅,虎丘竺法纲,“黑衣宰相”释慧琳。本专题据现有材料重点考述谢灵运的方外交游活动、交游倾向、交游对象,从而考察谢灵运的政治活动、宗教活动、文学活动,审视谢灵运的人生态度与价值取向。

第四,谢灵运的儒家思想。本专题探讨谢灵运复杂思想中传统儒家思想的成分与占据的地位。谢灵运的创作对儒家从政济世思想多有体现。例如他初仕时所写《撰征赋》,希望收复失土。被“讽旨令自解”时所作《劝伐河北书》渴望“区宇一统”。守永嘉时所作《白石岩下径行田》、《命学士讲书》自我检讨永嘉政绩,勉励在学之士立志有为,以及《北亭与吏民别》愧责自己学未有成、治未有功。等等。从谢灵运一生的出处行藏轨迹来看,最使他困扰不堪

的是仕与隐的矛盾,“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民间听讼,不复关怀”(《晋书》本传)。他的隐遁主要是自抚因政争而造成的创伤,他的狂放属于消极性反抗,实际是无可奈何又希冀被关注时的一种心理变态。他在诗中感叹:“感深操不固,质弱易扳缠。”他果真超脱,也就不至于狂傲。他的儒家思想看起来淡薄,实际是深入骨髓间的。

第五,谢灵运的道家思想。本专题旨在探讨谢灵运归隐与游遨的思想基础,尤其从他诗赋文章中离析其道家思想的成分。他在《山居赋》中说:“抱疾就闲,顺从性情,敢率所乐。”又说:“夫道可重,故物为轻;理宜存,故事斯忘。”还宣称:“(《老子》《庄子》)此二书最有理,过此以往,皆是圣人之教,独往者所弃。”由此可见老庄思想在谢灵运心目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重道轻物,顺性就闲,这是他面对政治危机时调整自我的行动指南,也是他归隐丘泽、游遨山水、审美悟道的思想基础。正因为这样,他不仅尊崇道家经典,而且他的山水诗创作中往往言必称老庄。所以清人方东树说:“读《庄子》熟,则知康乐所发,全是《庄》理。”(《昭昧詹言》卷五)

第六,谢灵运的佛学思想。谢灵运崇佛而不皈依,信而不佞。他致力的是佛学而非佛教。本专题考述谢灵运的佛学活动情况,探究其主要佛学思想。主要围绕以下事迹或文献:1)义熙九年(413)应慧远请作《佛影铭》;2)义熙十二年后所作《庐山慧远法师诔并序》、《庐山法师碑》;3)出守永嘉后所作《与诸道人辨宗论》,主“顿悟”说,折中儒释;4)初隐始宁时筑精舍,与昙隆、法流诸道人游,作《和范光禄祗洹像赞三首并序》与《昙隆法师诔》;5)著《十四音训叙》;6)改治《涅槃经》的时间地点问题;7)注《金刚经》事;8)临终施须事。

第七,谢灵运诗歌的“玄学尾巴”。本专题拟从晋宋思想学术史、文学发展史的角度,阐说谢灵运“玄学尾巴”的存在理由。

从思想学术史角度看,从曹魏后期到晋宋之际,玄学经历了三

个形态的变化。一是曹魏后期的“政治的玄学”，二是西晋时期的“哲学的玄学”，三是晋宋之际的“艺术的玄学”。受时代学术思潮的影响，文学创作也呈现不同的风貌。以正始为代表的曹魏后期文学创作“有玄无文”，以太康为代表的西晋时期文学创作“有文无玄”，以陶、谢为代表的晋宋之际文学创作“有文有玄”。谢灵运就生活在这样一个“艺术玄学”的时代，赏好“文义”成为时代风潮。因此，他不仅重“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而且重“义”，体现在诗歌创作中，就是向来颇受争议的“玄学尾巴”。

刘勰曰：“庄老告退，山水方滋。”从文学史实来看，实际是庄老告退而未及退，山水方滋而未成熟。这是文学转关的特殊时期，是文学转型的过渡期。晋宋之际，玄学调解融合了儒道释，并且越来越不动声色地渗透于文学创作之中，尤其是诗歌创作。陶渊明、谢灵运恰恰诞生于同一个历史时代，从体裁的角度看，他们一写田园诗，一写山水诗，而从深层内蕴分析，两者实质上都是“柱下之指归”的玄言诗。“山水以形媚道”，晋宋之际山水田园诗人借山水田园题材就东晋以来风行的玄言诗实施“淡化工程”。只不过陶渊明的“淡化”手法与效果要优于谢灵运罢了。陶、谢的政治地位不同，生活道路与价值取向不同，但在受玄学风习的影响与薰染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在晋宋三教调和这一特殊的历史文化时期，陶渊明倾向于接受道家恬退隐逸思想的影响，躬耕陇亩，体道于自然，悟道于心，欲辨已忘言，不落言筌，所以，他的田园诗深藏玄机，但玄味深长。对于“道”，陶是“悟”而不“辨”。谢则不同。他的创作高峰期在陶之后，正当刘宋好尚“文义”的风潮。“文”指文采，“义”指义解。谢灵运的玄学修养中更多佛教因明学思维惯性的影响，无形中受佛教传道布道利己利他思想的影响，加之志不获逞，隐而不甘，故虽有所“悟”却按抑不住欲“辨”，终未达到“得意忘言”的境界。由于“辨”而生出的尾巴，总体上看属多余之物，也是山水诗“方滋”之时未与正“告退”之庄老握手言别、彻底

摆脱纠葛的时代产物。

第八,谢灵运的文学思想。谢灵运不仅是一位多产作家,而且还辑编了不少文学专集或总集。他虽然没有专论文学思想的文章流传下来,但不能排除其作有文学专论的可能性。就现有材料,本专题重点讨论谢灵运以下几方面的文学思想。1)谢灵运注意到作家个性与文章风格之间的关系。如认为建安作家刘桢“卓犖偏人,而文最有气,所得颇经奇”(《拟魏太子邺中集八首》);2)认识到创作乃源于现实生活,故倾向于感物抒怀。所以他说:“昔文章之士,多作行旅赋。或欣在观国,或怵在斥徙,或述职邦邑,或羈役戎阵。事由于外,兴不自己。虽高才可推,求怀未惬。今量分告退,反身草泽,经涂履运,用感其心。”(《归涂赋并序》)应该看到,谢灵运大量的山水诗文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的创作;3)认为文学创作应该自由地抒发真实的情感,不拘旧式,允许创变。所以他说:“抱疾就闲,顺从性情,敢率所乐,而以作赋。扬子云云:‘诗人之赋丽以则。’文体宜兼,以成其美。今所赋既非京都宫观游猎声色之盛,而叙山野草木水石谷稼之事,才乏昔人,心放俗外,咏于文则可勉而就之,求丽,邈以远矣。”(《山居赋并序》)显然,这种思想已经摆脱了儒家“止乎礼义”的规范,是佛老者流率性而发精神影响的结果;4)认为文学创作活动本身与玄学参悟活动一样,具有舒忧娱乐、通神会性的功能。所以他说:“法音晨听,放生夕归。研书赏理,敷文奏怀。”又说:“伊昔韶皃,实爱斯文。援纸握管,会性通神。诗以言志,赋以敷陈。箴铭诔颂,咸各有伦。爰暨山栖,弥历年纪。幸多暇日,自求诸己。研精静虑,贞观厥美。怀秋成章,含笑奏理。”(《山居赋》)且自注曰:“谓少好文章,及山栖以来,别缘既阑,寻虑文咏,以尽暇日之适。便可得通神会性,以永终朝。”即此看来,他肆意游遨,大写山水诗文,乃为澄怀悟道,用白居易的话来说,正是:“谢公才廓落,与世不相遇。壮士郁不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大必笼天海,细不遗草树。岂惟玩景